

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综述

王勇¹ 徐扬帆¹ 吴紫薇²

(1.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摘要: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及其动态变迁。在宏观经济学领域,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 重点关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强调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 并且深入研究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增长难题, 还讨论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等经济运行的问题。梳理了近十年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论文, 总结了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典型事实、理论见解和实证结果, 并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提出了关于未来研究方向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新结构经济学; 结构转型; 产业政策; 宏观波动; 中等收入陷阱

DOI: 10.13885/j.issn.1000-2804.2021.01.006

中图分类号: F015;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21) 01-0048-09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 应该以理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新结构经济学是在经济学领域进行自主理论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 它立足于并系统总结于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1-2], 主张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 也就是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方法, 来研究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涵盖了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经济运行, 包括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 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3]。王勇等分别对2016-2017年和2018-2019年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成果和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 介绍了近年来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和智库研究方面的进展^[4-5]。

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涵盖了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分支学科, 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5-6]。其中, 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强调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结构与政策内生性的角度去更深入地研究宏观经济现象, 致力于重新构建一套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作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依据和参考, 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和健康的发展^[7]。事实上, 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的萌芽最初就始于林毅夫教授对1988年中国政府以“治理整顿”等行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的思索。

本文的主要目的, 是对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综述, 以期促进该领域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从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现实问题导向与结构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现象, 把现有的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现象并且假设“以

收稿日期: 2020-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20AJL017)

作者简介: 王勇 (1978-), 男, 上海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学研究。

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宏观经济领域涉及诸多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财政货币政策，等等。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的研究体系和当前已有的学术成果，重点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与大国增长、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这四个方向分别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厘清研究脉络和路径，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研究的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一、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这里所指的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3]。区别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和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区别于现有文献中结构变迁的其他理论机制，如非齐次效用函数^[8]、非平衡TFP增长^[9]、国际贸易^[10]、创造性毁灭^[11]，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理论机制，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研究也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内容^[12]。

Ju等首次构建了一个具有无穷多个产业的增长模型（后文简称JLW模型），将中观的产业和宏观的经济增长通过要素禀赋相联系，提出了要素禀赋驱动结构变迁的理论机制^[13]。即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产业呈现驼峰型的动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替代，总体生产函数内生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Wang等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把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相联系，基于不同的产业对高技能劳动力有着异质的需求，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解释了产业结构不断朝着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方向发展的路径^[14]。王勇等则将产业升级内生地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高收入弹性的奢侈品产业是否升级取决于需求，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产业是否升级取决于要素价格，不同于JLW模型解释产业间的转移，文章阐述了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产业内的资本深化^[15]。

围绕禀赋结构与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关系，国内外已有许多实证研究。在微观企业层面，Wang等使用第一手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人工成本上升时的行为选择，结果发现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搬迁而不是技术升级^[16]。朱兰等使用201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实证探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转型升级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提高企业自动化升级的概率，但是对其他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小或者不显著，从微观上支持了要素禀赋驱动产业升级的理论机制^[17]。在中观产业层面，欧阳志刚等使用中国省际层面和行业层面的26种投入要素禀赋，通过随机森林模型，揭示了不同生产投入要素在不同行业的重要性，发现每个地区具有不同的非充分发展行业、充分发展行业和要素约束行业，应根据要素结构特征选择优先发展行业和发展路径^[18]。在宏观增长层面，刘志彪等基于169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结构转换度指标，发现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愈加明显，但总体上结构转换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9]。

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是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前提之一。申广军基于比较优势研究僵尸企业分布，发现违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技术比较优势，如重化工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西部地区 and 能源大省的僵尸企业比例较高，论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企业自生能力”^[20]。姜磊等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违背比较优势的企业由于生产效率低、盈利能力差，需要借助负债的方式维持企业运行，导致企业杠杆率高^[21]。李力行等从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构建衡量地区比较优势的指标，发现经济开发区设置目标行业促进了相应行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其在城

市工业部门的份额,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重新配置,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22]。当目标行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开发区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

关于禀赋结构如何影响技术进步,Wang建立动态模型,阐述了当新技术资本密集并且可以私有时,内生的非竞争性市场结构,使得资本积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非单调的:当资本积累处于中间水平,会出现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市场的扭曲对经济效率不再产生影响^[23]。初始资本的增加会促进还是推迟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是不确定的。Lin等构建多产业的理论模型刻画资本积累通过技术选择驱动结构转型的机制,禀赋结构的变化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导致微观企业的生产技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24]。王勇等建立异质性内生增长模型,发现资本密集度与禀赋结构越一致的产业越倾向于采用自主创新而不是技术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解释了中国制造业各子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所占份额与相对资本密集度的倒U型关系,并且引入与技术前沿差距的产业异质性,解释了其与劳动生产率离技术前沿差距的负相关关系^[25]。

拓展到开放经济环境下,王勇建立两国模型,说明贸易和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动态的影响有可能是非单调的^[26]。先进国家的投资专属技术进步是否促进了贸易伙伴国的产出增长,取决于跨期贸易条件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的相互作用。Ju等建立具有异质劳动力的H-O贸易模型,解释了中国实际汇率为何从2005年才开始稳定增值,以及经常账户盈余和技术溢价的显著提升^[27]。这是因为进口和出口部门熟练劳动力密集度不同,出口部门更快的TFP增长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上升,以及非熟练劳动力的过度供应导致劳动力成本较低,共同抑制了非贸易商品相对于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上涨以及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

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①[29-30]。这是因为市场有效才能正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保证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但市场中总是存在一些外部性和交易成本,这时候就需要有为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市场失灵。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优化资源配置、纠正市场失灵、激励先行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1]。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因势利导型政府就是要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适时地调整目标产业,让企业逐渐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度中等的产业,最后再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王勇等构建理论模型阐释因势利导型的有为政府应当如何选择需要扶持的产业,并讨论了政府不作为或乱为的后果^[32]。如果政府不作为,可能会导致所有企业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度中等的产业之后就停留在这个产业,而不是继续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而如果政府乱为,从一开始就鼓励企业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那么在升级的过程中消费会被极大程度地限制,社会的整体经济福利反而低于因势利导型政府所带来的社会福利。

至于如何甄别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Lin等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并且认为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信息、对于存在的外部性给予补贴、及时配合禀赋结构的变化提升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保护特定的企业和产业^[33]。Lin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按照禀赋结构、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和技术周期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产业五大类^[34]。五类产业不同的禀赋结构、规模特性、风险特性等,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会有不同。针对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同的瓶颈约束,政府应当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

①“有效市场”是指通过价格信号和机制使得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有效的市场制度安排。“有为政府”是指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培育、监督、保护、补充市场,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增进全社会各阶层的长期福利水平^[28]。

唐恒等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理论与案例》一书中，针对新时期中国的五类产业提出了不同的知识产权战略和政策，并通过具体的企业案例进行了阐释^[35]。

在具体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林毅夫等正在推进的研究是针对Rosenstein-Rodan^[36]提出的大推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的外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产品互补的部门同时投资可以创造相互间的需求；二是对生产互补的产业部门同时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存在这种外部性，政府应该同时投资具有关联的产业。Murphy等用理论模型证明了当产业升级存在固定成本时，存在多重均衡，此时如果一个产业单独升级是亏损的，而如果所有产业同时升级就能获得正利润，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协调所有产业同时升级，即为“大推动”^[37]。但是这篇文章的模型中劳动力是惟一的生产要素，并没有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本禀赋是否会对“大推动”的效果有所影响。在此基础上，Lin等加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讨论不同禀赋结构的国家产业升级与对应的产业政策的区别。研究发现，加入资本要素之后，模型并不存在多重均衡，但是依旧存在外部性，政府仍然需要通过一些财政政策来使得企业做出对于经济增长最好的产业升级决策^[38]。

在实证与案例研究方面，林毅夫等利用2000–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数据，研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39]。研究发现，经济开发区内存在内生的生产率溢价，同时其集聚效应并不明显。此外，经济开发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朱兰等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基于三类要素、五大产业和多层政府，为推进新形势下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40]。于佳等则对中国光伏产业的产业政策做了案例研究，并认为光伏产业的发展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41]。光伏产业经历了从追赶到领先的过程，目前已经成为转进型产业，因此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及时走出去。

三、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国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中等收入阶段作为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重要阶段，厘清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特征和机制，对于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弥补传统发展经济学关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研究的不足。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帮助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利用后发优势并将其转变为竞争优势，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径^[42]。陈斌开等使用衡量产业结构扭曲程度的技术选择指数衡量政府发展战略，检验政府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实施赶超战略的经济体，发生经济停滞的可能性更大，经济增长率也更低^[4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已有不少文献进行了尝试性研究。Wang等构建理论模型，说明了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三明治效应”：即低收入国家的“追逐效应”和发达国家的“压制效应”^[44]。Lin等对比分析陷入陷阱与没有陷入陷阱国家的垂直结构差异，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一致的^[45]。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最优结构不同。程文等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认为收入提高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和高收入消费者的匹配效应，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带来的价格效应互相作用^[46]。在中低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制约自主创新能力，但在中高收入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从而导致经济停滞。张建华等选取1950–2010年45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的数据，构建包含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发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大都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情况，但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体的服务业结构有关^[47]。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朱兰采用

1975-1995年48个经济体专利引用数据,发现国家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依赖于经济体所处的收入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48]。徐朝阳等构建两部门结构变迁模型,证明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中,如果服务业存在供给抑制,会造成供求错配、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等问题,使得经济增速低于潜在水平^[49]。

除了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的持续增长问题,中国作为惟一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转型过程(即结构转型过程、经济转轨过程、对外开放过程和大国崛起过程)的发展中大国^[50],需要面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王勇等利用美国和日本贸易战期间的数据,并构建理论模型,发现长期而言,发达国家的遏制性政策可能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禀赋驱动产业升级,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对发达国家的产出与福利的影响是非单调的,长期影响取决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51]。

四、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

经济增长与波动、宏观政策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原因究竟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因素,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林毅夫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造成的^[52]。原因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性的扭曲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的经济表现会影响世界,世界的经济表现也会影响中国,并且不存在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的金砖国家和同样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在同时间段出现了更大幅度的经济下滑。王勇等运用AS-AD模型并结合现实中价格序列数据分析,认为是需求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提出了中国作为同时经历的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很多问题都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全面考虑。特别是对于中国内部体制问题,需要结合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对应的结构性过程去分析扭曲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否则容易犯“新自由主义”错误,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53]。

短期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两大主题之一。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虽然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在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42]。对于经济的周期性变化研究方面,Boldrin等发现生产要素份额除了趋势性变化之外的持续性周期模式,文章假定不同代的资本具有异质性,建立模型解释周期性的原因,在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内生变化导致了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54]。林毅夫等用“潮涌现象”解释经济波动,即在短期内众多企业过度投资某一领域和行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浪费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导致经济波动^[55]。龚刚等认为在中国,投资波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产出波动态势^[56]。Wang等研究在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即在JLW模型中引入搜寻匹配模型,解释宏观均衡失业率如何随着产业升级发生周期性波动^[57]。张云等构建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企业目标转换和双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中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因素^[58]。数值模拟分析反映了投资是影响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缓解金融摩擦有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家庭储蓄和企业自有资金具有平滑信贷波动的作用,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加速效应弱于需求端。企业目标转换通过经济结构对金融摩擦的加速效应可以起到增强或弱化效果。

关于应对经济波动的宏观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主义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投资和消费可以平滑经济周期;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则基于李嘉图等价理论,认为家庭预期到未来政府加税以支付财政赤字的行为,会为了平滑消费而增加储蓄,从而总需求不会增加,反对在衰退和萧条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把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短期可以增加需求减少失业,稳定经济增长,长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税收,补偿积极财政所增加的赤字^[42]。Jiang等在模型中引入基础设施作为投资渠道,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挤入效应”,并且建立一个内生的资产泡沫供给模型,以研究房

地产泡沫如何在行业间配置资源^[59]。研究表明土地财政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和非住房投资增长现象并存的原因。模型预测，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产价格将下降42%，GDP下降5.8%，但长期而言，经济产出水平会比房地产泡沫未破灭的情况更高。此外，征收房产税能够减小房地产泡沫，抵消售地收入的减少。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无论利率多低都难以刺激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并且会出现流动性陷阱。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也可以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更为有效，并且利率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也有分配不均的风险。Lin等建立存在信用约束的熊彼特重叠世代模型以研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60]。研究表明在基准情况下，货币是超中性的，只有当金融发展超过某个临界水平，后发国家的经济才将追赶并收敛到世界技术前沿。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在过去多年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崭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区别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和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等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及其动态变迁。本文主要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宏观领域关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国增长、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的研究。除了上述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还涉及国企改革^{[50][61]}、资本流入^[62]、贸易冲击^[63]等议题。

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目前在国内外顶尖杂志上的发表依旧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理论创新的难度本身较大，另一方面是受限于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宏微观数据。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结构视角往往需要突破当前宏观经济学单部门模型（或者不存在结构变迁的多部门模型）的主流假设，从而在理论分析上会变得更加复杂^[64]。当前关于中国宏观问题的学术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主流宏观教科书模型作为基准分析框架，使用中国数据来验证基于发达国家现象提炼出来的理论模型，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不同直接简单处理为外生的“扭曲”，然后以发达国家作为基础进行各种消除“扭曲”的反事实分析，却忽略了这些“扭曲”的内生性，忽略发展中经济体因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内生差异。再加上，中国是唯一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在宏观定量事实的整理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讨论上，需要处理多种动态过程共存所带来的复杂性，在建模处理上挑战更大。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比如，关于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长时间、高频率、可靠的关于数量与价格的数据，在研究发达国家相关问题面临的数据挑战较少，相关研究也较多，但在研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时，在事实梳理和定量研究方面则面临更高的挑战。

基于前期研究基础，新结构经济学未来在宏观领域的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第一，与“垂直结构”相关的研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产业结构逐渐形成了垂直结构特征^[65]，即上游产业更多为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国有企业且行政垄断更加严重，而下游产业则多为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下游产业更加接近完全竞争且出口的占比也更高。这一垂直结构对于分析中国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都很有启发^[50]。

第二，在产业动态框架下加入异质性企业的动态分析。现有关于企业动态的主流模型都是单部门模型，因此需要引入外生的冲击才能拟合数据中所观察到的企业的死亡。Ju等^[13]构建的模型解释了禀赋驱动的产业动态升级，但是假定产业内的企业是同质的，因此无法解释相同产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

非对称的生命周期的动态特征,也无法解释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的非对称的动态特点。因此,需要将异质性企业的动态引入到JLW模型框架下,分析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不同产业内的不同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等生命周期动态,从而更好地理解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微观企业基础。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分析各种摩擦条件下的现象,比如僵尸企业问题与基于企业大小的产业政策分析等等。新结构经济学目前在这个方面仅有少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需要更加丰富和翔实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第三,与大国增长外部风险相关的研究。大国与小国存在很多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今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其经济增长过程难免会受到更多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存在各种政策博弈。因此,应该对大国崛起过程中相应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问题做更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五大类产业中的战略型产业。如何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都是亟需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巨大冲击,如何对冲击之下出现的逆全球化新趋势、价值链本地化、投资消费出口萎缩等经济新现象进行事实描述,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把握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并提出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是未来新结构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需要努力的方向。王勇在疫情背景下反思宏观经济学研究,认为应该更加突出“信息集”“预期”与“不确定性”的作用,包容市场失灵现象,并加强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的互动^[6]。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17(2):729-752.
- [2] 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44(9):4-40.
- [3] 林毅夫.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2):1-18.
- [4] 王勇,柯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叶初升.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2017.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 [5] 王勇,朱欢,文永恒,等.2019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年度报告//叶初升.中国发展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8-2019.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
- [6] 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 [7] 林毅夫.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研究,2007(1):126-131.
- [8] Kongsamut P, Rebelo S, Xie D. Beyond Balanced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1, 68(4): 869-882.
- [9] Ngai L R, Pissarides C A.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 429-443.
- [10] Matsuyama K. Structural Chang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A Global View of Manufacturing Declin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9, 7(2-3): 478-486.
- [11] 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1992, 60(2): 323-351.
- [12] 王勇,汤学敏.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定量事实与理论进展.经济评论,2021(1):71-86.
- [13] Ju J, Lin J Y, Wang Y.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5, 76: 244-263.
- [14] Wang Y, Tang X. Human Capital, Skill Premium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INSE Working Paper, 2019.
- [15] 王勇,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经济学(季刊),2018(2):801-824.
- [16] Wang F, Xia J, Xu J. To Upgrade or to Relocate? Explaining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Chinese Light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ising Labor Cos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0: 101333.
- [17] 朱兰,王勇.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行为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调研数据的分析.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9.

- [18] 欧阳志刚, 陈普. 要素禀赋、地方工业行业发展与行业选择. 经济研究, 2020, 55 (1): 82-9.
- [19] 刘志彪, 凌永辉. 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 管理世界, 2020, 36 (7): 15-29.
- [20] 申广军. 比较优势与僵尸企业: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管理世界, 2016 (12): 13-24.
- [21] 姜磊, 郭玉清, 刘梦琰. 比较优势与企业杠杆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 (6): 146-156.
- [22] 李力行, 申广军. 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学 (季刊), 2015, 14 (3): 885-910.
- [23] Wang Y. Market Structure, Factor Endowment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SE Working Paper, 2014.
- [24] Lin J Y, Liu Z, Zhang B. Endowments, Technology Choic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SE Working Paper, 2020.
- [25] 王勇, 樊仲琛, 李欣泽. 禀赋结构、研发创新与产业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2020.
- [26] 王勇. 产业动态、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 (季刊), 2018 (2): 753-780.
- [27] Ju J, Lin J Y, Liu Q, et al.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Dynamics. INSE Working Paper, 2020.
- [28] 王勇, 华秀萍. 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 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 经济评论, 2017 (3): 17-30.
- [29] Lin J Y.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Economies Can Take Off.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0] Lin J 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2.
- [31] Wang Y. Role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Chapter in China 2049. Brookings Institutions, edited by David Dollar, Yiping Huang and Yang Yao, 2020.
- [32] 王勇, 林毅夫, 鞠建东. 因势利导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 一个新结构经济学模型.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9.
- [33] Lin J Y, Monga C.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Growth.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 29(3): 264-290.
- [34] Lin J Y.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7, 15(1): 5-18.
- [35] 唐恒, 王勇, 赵秋运.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 理论与案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36] Rosenstein-Rodan P N.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The Economic Journal, 1943, 53(210/211): 202-211.
- [37] Murphy K M, Shleifer A, Vishny R W.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5): 1003-1026.
- [38] Lin J Y, Wang Y, Wen Y, et al. Endowment Structure and Role of State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forms. Working in Progress, 2021.
- [39] 林毅夫, 向为, 余淼杰. 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 经济学 (季刊), 2018, 17 (2): 781-800.
- [40] 朱兰, 王勇, 李泉剑.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以宁波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 经济科学, 2020 (5): 5-18.
- [41] 于佳, 王勇.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与“一带一路”新机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解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0 (5): 87-98.
- [42]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经济评论, 2017 (3): 4-16.
- [43] 陈斌开, 伏霖. 发展战略与经济停滞. 世界经济, 2018, 41 (1): 52-77.
- [44] Wang Y, Wei S. Sandwich Effect: Challenges fo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INSE Working Paper, 2019.
- [45] Lin Y, Wang Y.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Middle Income Trap.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2020(2): 359-394.
- [46] 程文, 张建华. 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兼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跨越. 经济研究, 2018, 53 (4): 47-62.
- [47] 张建华, 程文. 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3): 39-61, 205.
- [48] 朱兰. 国家创新能力视角下的中等收入转型——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12): 16-28.
- [49] 徐朝阳, 张斌. 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内需扩展: 基于服务业供给抑制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1): 64-83.
- [50] 王勇. “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际经济评论, 2017 (5): 9-28, 4.
- [51] 王勇, 江深哲, 李欣泽. 产业竞争、贸易政策风险与大国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20.
- [52] 林毅夫. 中国经济增长变化趋势与成因. 学习与探索, 2018 (4): 1-4.

- [53] 王勇, 卢锋.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与对策. 学习与探索, 2018 (10): 133-140.
- [54] Boldrin M, Wang Y, Zhu L. 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Factor Shares. INSE Working Paper, 2019. No. E2019010.
- [55] 林毅夫, 巫和懋, 邢亦青.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经济研究, 2010, 45 (10): 4-19.
- [56] 龚刚, 林毅夫. 过度反应: 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 经济研究, 2007 (4): 53-66.
- [57] Wang Y, Chen 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Skill Mismatch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INSE Working Paper, 2019.
- [58] 张云, 李俊青, 张四灿. 双重金融摩擦、企业目标转换与中国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 2020, 55 (1): 7-32.
- [59] Jiang S, Miao J, Zhang Y. China's Housing Bubb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SE Working Paper, 2019.
- [60] Lin Y, Miao J, Wang P. Converge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alysis. Economic Theory, 2019, 69: 523-568.
- [61]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社会科学战线, 2019 (1): 41-48.
- [62] Lin Y, Wang X.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SE Working Paper, 2019. No. E2019003.
- [63] Choi J, Xu M.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he China Syndrome: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n Manufacturing. INSE Working Paper, 2019. No. E2019007.
- [64] Lin J Y, Wang Y. 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Oxford Handbook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65] 李系, 刘学文, 王勇. 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 经济学报, 2014, 1 (4): 1-48.
- [66] 王勇.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对宏观经济学建模的思考. 经济评论, 2020 (4): 41-45.

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Macroeconomics

WANG Yong¹ XU Yang-fan¹ WU Zi-wei²

(1.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2.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mphasizes endogeneity and dynamic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of an economy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field of macroeconomics, it takes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as entry point, focuses mainly on industrial upgrade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ctive government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conducts in-depth studies on the growth difficulties facing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economic operation like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macro policie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academic papers in the recent decade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macroeconomics, summarizes typical fact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in current studies.

Keyword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policy; macro fluctuation; middle-income trap

(责任编辑:贾 宜)